

翻译研究的学科化：知识建构还是话语策略

潘琳玲，徐岚

(淮海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5)

摘要：学科是知识划分的制度化结果，其通过学科范式和规训使知识生产在差异性和排他性中划定“不可渗透性”边界。当代翻译研究在社会、文化等转向之后，逐渐成为一个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更多是在与其他学科“互涉”的去学科化逻辑中完成知识建构的。学科的本质是权力，翻译研究学科化的根本动因是谋求学术权力和体制生存的一种话语策略。从知识发展角度来看，学科并非翻译研究的最终归属，翻译研究的未来方向应当从“学科化”转向“知识化”，在学科中做多学科研究将是翻译研究的理性选择和长期状态。

关键词：学科；翻译研究；知识；话语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6)02-0220-05

翻译研究是否是一门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之间经历了激烈争论，而后进入沉寂，尤其是翻译研究在学术体制内的建制成功，终结了关于学科化的很多讨论。当下翻译研究在中国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各种迹象都在表明“翻译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1](77)}。本文并非意在争论翻译研究的学科归属，而是想借助学科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研究的现状与方向。多年来，我们一直将学科作为翻译研究的奋斗目标，但对学科目标本身缺少深入了解，更多的功夫放在了“学科化”，而很少去“化学科”。然而，如果不了解学科的逻辑内涵以及翻译研究的学科属性，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就有可能南辕北辙，我们当下的学科建设就可能偏离知识探索的价值方向。国内翻译研究在经历几十年长足发展之后，我们需要回溯翻译研究的知识演进过程：学科的内涵与本质到底是什么？学科化符合翻译研究作为实践性学科的属性与逻辑吗？如果从知识发展的角度，学科化并非是翻译研究的最优选择，那我们学科化的理由和出路又何在？

一、学科建制的制度逻辑

学科是对人类知识体系进行划分的方式和结果，当关于世界的学问知识超越个体掌握能力时，我们就只能分科取之，这是学科诞生的知识源头。从词源学

来看，学科最早与知识学习相关，discipline 就来源于拉丁语的动词“学习”(discere)及其派生出的名词“学习者”(discipulus)。现代英语、法语中的discipline以及德语中的disziplin虽然与discere有关，但其语义内涵却主要来源于disciplina(纪律、规训、约束之意)一词。因此在英、法、德等语言中，学科(discipline)更多指向一种社会意义的建制，即纪律和规训的意思。学科作为一种人为主观建构的产物，一方面是便于认识世界的知识分类系统，另一方面是规范知识生产的学术规则体系。通常而言，我们习惯从知识结构、逻辑起点和理论体系等知识角度来理解学科，而忽视了学科作为一种建制和规训的深层内涵。

学科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知识建制，主要来自托马斯·库恩所谓的“范式”意义。范式(paradigm)最早由库恩在研究科学革命结构时提出，用于指示被某一知识共同体所共享的一套特定的理念、价值、方法和技术，体现为知识领域中的认知和行为规范。^{[2](175)}范式是对本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内在确认，它要求学科的构建必须有其专属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研究方法，专有性、独特性和自足性是学科之为学科的基本属性。“学科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学科都试图对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研究内容最为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3](32)}因此，学科形成的关键在于对其知识边界的充分确定，并据此产生相应的学科规范，如果

收稿日期：2015-10-15；修回日期：2016-01-28

基金项目：2015年度淮海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翻译研究的学科化转型研究”(S2015002)

作者简介：潘琳玲(1981-)，女，江苏灌云人，淮海工学院国际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基本理论；徐岚(1970-)，女，上海人，淮海工学院国际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交际

缺少范式屏蔽, 一门学科就会成为任由其他学科随意进出的公开领域而不是专属领地。

可见, 一门学科的制度化过程实际就是划定学科领地和边界, 进而建立学科身份意识, 使学科的观念形态与组织形态融为一体的过程。这种“知识圈地”使得一个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概念范畴等方面收拢于一个相对固定的知识空间, 成为一个学科就意味着将一门学问以垄断性的方式交给这门学科从业者。这种垄断性边界通常借助学科规训的方式来固化和维护, 规训意味着学术研究人员如果不在一门学科内经过长期的专业化训练, 就无法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学科规训实际上设置了学科从业标准, 标识学科内在特有的话语系统和技术规范, 使学科内外建立一种知识落差, 进而突显和确立本学科专业主义优势。人类知识在进入大生产阶段后, 遂沿袭这种学科逻辑不断分门别类地递进演化, 即便在今天各科知识如此交融的时代, 依然难以撼动学科的制度化力量。

二、翻译研究学科化的现实取径

走向学科是各类知识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必然结果, 与其他邻近学科相比, 翻译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可谓一波三折。翻译研究早期发轫于比较文学研究, 在过去一直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 这一时期翻译研究重视和突出语文学范式, 以“信、达、雅”等准则为代表。其后, 翻译研究开始转向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 通过借助大量语言学知识来揭示翻译的内在规律和原理, 并藉此建构了翻译学的理论化体系。由文学和语言学开创的研究范式统治了翻译研究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 但是这种将“忠实”和“等值”奉为主臬的思想也使得翻译研究裹足不前。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认识到仅仅局限于狭隘的语言文本无异于作茧自缚, 坚持语言中心论只能使翻译研究的道路越走越窄。到 20 世纪 90 年代, 以语言学范式为基础的翻译研究基本走向完结, 以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为知识来源的研究范式极大扩展甚至重构了翻译学知识领域, 在此不得不提在译学界引起震荡的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受启发于文化研究学派, 这种文化学范式将翻译视为宏观的文化转换, 进而借助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引出更宏大的社会课题。文化学范式实际跳出了传统翻译研究以“句法—语义”为中心的语言目标模式, 更多将文本置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量, 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视阈。

“于是, 突破语言, 突破文学, 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4](2)}文化转向背后反映的是翻译活动与世界发生关联的方式产生变化, “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跨语境的阐释”^{[5](29)}。伴随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 日益突出与社会和文化的实践互动关系, 翻译研究愈发朝向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而非专属的学科发展。在笔者看来, 所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其最大意义不在于是否真的转向了文化, 而在于转向文化研究对译学定势的深层启蒙, 转向一种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可能。“翻译研究的视角正在通过‘语言’‘文化’‘社会’而勾勒出更为广阔的跨学科前景, 正在超越当下而进入一个翻译研究的后时代(post-translation studies)。”^{[6](10)}

翻译是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 如何界定翻译直接决定了翻译研究的开展及其学科化, 正如 Tymoczko 指出“翻译研究的首要目标便是尝试给翻译下一个定义”^{[7](1082)}。如果将翻译仅视为文本和语言转换, 翻译研究必然是比较文学或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只能作为其下的一个三级学科; 如果将其定义为一种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互动, 翻译研究则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于对比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等任何学科领域的自满自足的学科”^{[8](16)}。从翻译研究的范式转换轨迹可以看出, 整个翻译研究的边界不断趋于扩大, 愈发朝着一种“大翻译”的方向发展。当代翻译研究的问题域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翻译与社会、文化、传播的界面上, 翻译研究也更多是与这些学科“互涉”的结果。“随着文化社会态度、话语空间以及各种权力形式介入到翻译研究——旨在应对翻译实践的复杂化, 翻译的学科身份必然趋于跨学科性质。”^{[9](5)}事实上, 我们做的很多研究也已经突破了原有翻译学的范畴, 许多新兴的机器翻译、外宣翻译、视觉翻译等研究需要大量借助其他学科知识, 如口译、机器翻译就和认知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非常相关, 而外宣翻译则和政治学、传播学联系极为紧密, 这些领域恰恰是最具知识创新的增长点。当翻译研究的对象开始从单一化、绝对化走向复杂化、相对化, 多元对象与多元方法的交叉复合便成为当下翻译研究发展的新常态。

翻译学在西方已经事实上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要看到, 西方翻译研究整体上采取更宏观的视角, 特别是西方近几十年来的翻译研究, 早已经跳出传统语言范式和文学范式的局限, 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政治和传播等学科角度开展研究和构建理论。Snell-Hornby 在对传统翻译研究中“语言学派”和“操纵学派”的批判中, 就主张新的翻译学科应该是一个

具有“综合性”的学科领域。^{[10](13-25)}Wilss 也认为翻译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并将翻译学置于由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心理学构成的学科六边形之中。^{[11](131-144)}可以说,翻译研究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是其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而非传统意义下的学科所带来的。多学科已经成为当下翻译研究的基本属性和知识特点,这里的多学科既包括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方法来分析翻译活动,也包括借助其他学科的视角来解释翻译问题。翻译研究的这种多源流知识属性,使其难以做到像传统学科那样专门化,因而所体现出的学科性也相对较弱。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翻译最初都是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的一个手段,随着这种交换活动的扩大产生了对翻译有针对性的研究。从知识源头来说,翻译研究更多地是一个以实践性为主的研究领域。相对基础学科固有的理论偏好,翻译研究的应用性取向则较为明显,其主要通过对不同具体问题的解决来积累知识。这里我们就需要对翻译研究的知识属性进行明确,笔者认为,翻译研究是以应用研究为主体的兼有理论性的研究,我们要承认翻译本体研究——也就是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但同时要看到翻译研究的生命力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大量应用性领域中。翻译研究的实践性和实践品格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实践和应用取向决定了翻译研究无法像传统学科那样强调学科边界、突出学科专有性,更多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共同参与,才能保持翻译研究的多元开放和活力生机。

当前的翻译研究已经不再具有学科专属性和排他性,而逐渐成为一个聚集多学科知识的研究领域,多学科研究范式使得翻译研究更多显示出“领域”而不是“学科”的特征。学科和领域的区别在于,学科的边界通常不可渗透,而领域的边界则具有可渗透性。“不可渗透的边界一般说来是紧密扣连汇聚的学科规训社群,也是那个知识范围的稳定性和整合的指标。可渗透的边界伴随而来的是松散、分布广泛的学术群,亦标志更分散的较不稳定的和相对开放的知识结构。”^{[12](22)}作为研究领域的翻译学,没有固定森严的知识生产边界,只要能与翻译产生关联的学问都能进入研究视野,成为翻译研究的方法和议题。翻译研究的知识演进过程恰恰“回避”了学科化的基本特征,与学科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不是渐近而是渐远——翻译研究正是在学科逻辑的反向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这种理想与现实间的背反使我们对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增加了几份困惑,翻译研究的现状与其学科化目标产生了事实上的分裂,看似“言行不一”的背后实际蕴含的是一个复杂微妙的学科情结。

三、翻译研究学科化的话语策略

学科从其诞生起,就不仅仅是对知识分类的确认,而是维护知识生产秩序和保障学术资源的工具,用福柯的话来说,学科的本质就是权力。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书中对学科的形成过程和组织模式给出了犀利的评判,使我们意识到学科不单是知识集合,更是权力和话语机制。学科实际是社会制度延伸到知识领域的一部分,是知识领域社会学属性的体现,其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利益维护与话语策略。“话语”一旦产生就会形成一个控制、筛选和分配的程序机制,学科实际就是一个生产话语的控制体系,它通过设置规则同一性来划定边界和掌控权力。^{[13](224)}学科对知识及其生产进行规制的需要,使得学科作为一种权力和控制有其必要性,正如福柯后来所言“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14](27)}。因此,认识到学科的权力本质,会使我们看到翻译研究学科化的根本动因是权力,是借助学科形成的知识权力不断获取学术生存和发展资源的一种话语策略。

国内翻译学界之所以如此在意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对学科独立孜孜以求,对学科丧失痛心疾首,其背后恐怕离不开这种权力和话语因素。西方翻译学者 Hermans 早就指出:“承认翻译研究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可以营造更好的外部学术环境,为翻译研究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15](15-16)}学科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基本单位,如同“知识户口”一样。如果缺少学科这样一个制度化身份,翻译研究在学界的地位就无法得到认同,研究成果也难以得到公允承认。翻译研究要想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借助学科化形成的话语权力为翻译学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一个稳定的学术从业保障,一个可以交流思想和传递薪火的平台。在这个既定的知识生产体制下,任何学术资源的分配都建立在以学科为基础的权力构架内,从专业审批、课题申报到成果评定等环节都离不开学科,只有学科化才能聚拢各种资源确保翻译研究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翻译研究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继续偏安于语言学和文学门下,会严重制约其学术发展。这恐怕是国内译学界的一个共识,也是翻译研究学科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所在。

学科作为知识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形态,不仅为知识生产提供外在的制度保障,它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还为从业者提供对自身学术价值的心理认同。这种对学科话语体系和知识规则的认同是构成学术共同体的基

础, 其通过学术发表等形式将有共同研究志趣的人结成超时空网络, 并借助规训的方式保证学术研究能“群之”和“继之”, 学科从业人员正是从这种共同体中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 这种话语策略既有现实的考量也有情感的因素, 尤其对于中国学人来说, 如果所从事的一门学术研究不能作为学科, 就无法获得内在的身份认同和心理稳定, 就会有浮萍一样的漂泊感。这里面还涉及一个文化心理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 学科化是知识逻辑的必然产物, 也是学者获得同行承认、专业话语权以及身份归属和价值实现的基本前提。

翻译研究的学科情结是学科逻辑与现实语境相结合的产物, 如果不学科化, 翻译研究就会始终处于“妾身未名”的状态, 被排挤在学术体制之外。这种学科化的强烈动机和冲动离不开知识背后的权力及话语因素, 不考虑这些权力和话语问题就无法领会学科化诉求的本源。事实上, 争论翻译研究能否作为学科, 或者是否成为学科, 其意义都已经不再重大。学科化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不在于知识增长的建构方式, 而是学术生存的话语策略。体制是一种任何个体无法与之抗衡的强大力量, 现代学术体制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或倾覆, 所有知识研究都需要借助学科化的方式在学术体制中扎根安营。相比西方而言, 我们的学术体制化程度更为深厚, 关于翻译学科建设的众多笔墨正是浓郁学科情结的表现。因此翻译研究要想繁荣就必须走学科化道路, 谋求设立翻译学学位点和进入学科目录; 而离开学科的翻译研究难以得到长久和稳定发展。

四、翻译研究的学科逻辑与学问逻辑

翻译研究实际存在两种学术状态: 一种是作为知识探究的翻译研究, 另一种是作为社会建制的翻译研究。这两种存在状态经常不是统一的, 甚至相互抵牾。从知识建构的角度来说, 翻译研究的知识属性要求其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式, 更适合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而非独立学科, 以获得知识发展的活力与创造力。然而, 从社会建制的角度来看,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却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谋求学术身份和推动整个翻译研究事业发展不可或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 一方面我们须臾离不开学科, 需要学科为翻译研究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另一方面对于翻译研究这样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来说, 学科化却并非发展知识的最有力途径。这种对立背后有形式逻辑的

成分, 但更多是现实语境的产物, 作为与翻译研究有着类似知识属性的传播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非演绎式的启发。

传播研究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迅速发展, 取得学科建制并成为时代显学, 其中, 被后世称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Wilbur Schramm)功不可没。施拉姆一方面是传播研究制度建构的主要奠基人, 通过学科化方式使传播学在现代学术体制中立足; 另一方面, 施拉姆本人却极力反对传播学的制度化, 坚持一种反学科和去学科的研究立场, 并时刻提醒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field)而不是一个学科(discipline)。施拉姆构建传播学科的策略是实用性而非学术性的, 正因如此, 才能够让传播学迅速完成学科建制并得到学术体制认可。但是在发展传播学时, 施拉姆却主张淡化学科意识甚至放下学科观念, 努力从多学科视角对传播现象进行研究。^{[16](6-17)}这种看似矛盾的学科构建方式恰恰使得传播学一方面在学术体制内取得学科地位, 另一方面又能够让传播学以去学科化的方式获得知识增长, 其中的学术生存智慧值得玩味。

施拉姆的经验反映出, 学科在知识建构和话语策略两个层面能够得到整合, 而且必须进行重构。翻译研究仍要走学科化道路,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只不过学科化的价值和意义不再是传统的知识建构, 而是学术场域的制度理性, 其目标是开放多元的知识探究提供更好的体制保障。这种学科建制将成为激发翻译学术知识增长的创新中心, 成为汇聚不同学科进行交流、争论与发表的思想平台。从这个角度看待翻译研究的学科化或许是更加趋于合理的态度, 如果继续依从传统的学科逻辑按图索骥, 则很有可能不利于翻译研究的长远发展。因此翻译研究一方面要推进学科建设, 另一方面又要淡化学科意识, 前者是生存之道, 后者是创造之源, 这种分裂性是翻译研究作为实践和新兴学科不可逃循的“共业”。作为学科来建设, 作为领域去研究, 或许是折中理想与现实的可行路径。

制度化的学科建设只是翻译研究的外部保障, 知识发展才是翻译研究的内在核心与终极所指。从知识发展角度来看, 学科的存在意义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 翻译研究能否成为一门有思想和有活力的学问比翻译研究是否作为一门制度化的学科要重要的多。比学科化更为紧要的是, 我们的研究能否揭示翻译活动的真实状态, 能否加深对翻译现象和本质的理解, 能否满足翻译实践对知识的需求。翻译研究的知识发展核心在于使其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而非仅仅作为一门“学科”。因此, 翻译研究的未来路径应当从注重学科化转向知识化, 这就需要我们暂且搁置“社会转

向”与“文化转向”的争议,将翻译研究统一到“知识转向”上来。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就是在不改变原有学科建构的基础上,借助一个更大的知识研究系统代替传统的学科研究系统,进而不断消解和突破学科边界,通过科际整合的方式实现知识的增长和创新。知识建构不能遵循学科逻辑,而应该遵循学问逻辑,从学科到学问正是翻译研究学科化走向成熟的标志。

现代学术体制是一个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共存的系统,这种专门化和技术化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也会带来偏差。从目前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现状及趋势来看,翻译研究逐渐迈向一个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多学科和跨学科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基本范式,这是所有翻译研究者需要坦然接受的事实。翻译研究从知识本质上更多具有横断学科的特性,是“一门居于多学科临界状态的边缘学科”^{[8](16)}。面对翻译研究的边界扩大和对象多元,我们不能以学科边界拒之于门外,更不能用学科化大刀将其斩去,而应该思考如何包容和汇通多学科研究。过于突出学科意识往往会削弱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互动能力,一旦这种学术互通因为学科化带来的壁垒而遭受阻碍,翻译研究的知识来源和创新灵感就会枯竭,面临学科停滞和衰落的危险。翻译研究既离不开“学科化”,更少不了“化学科”,在学科中做多学科研究将是翻译研究的理性选择和长期状态。

参考文献:

- [1] 许钧,穆雷.中国翻译学研究30年(1978—2007)[J].外国语,2009(1):77-87.
- [2] Kuhn T.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75.
- [3]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2.
- [4] 谢天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06(3):1-14.
- [5] 潘琳玲.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译学审思——“反向格义”抑或“中西会通”[J].北京社会科学,2015(8):29-35.
- [6] 胡牧.翻译研究:回归现实世界——对“文化转向”的再思考[J].中国翻译,2011(5):5-10.
- [7] Tymoczko M. Trajectories of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Meta, 2005, 50(4): 1082-1097.
- [8] 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6.
- [9] 孙艺凤.翻译学的何去何从[J].中国翻译,2010(2):5-10.
- [10]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13-25.
- [11] Wilss W. Interdisciplinarit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arget, 1999, 11(1): 131-144.
- [12] 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2.
- [13]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on Language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2: 224.
- [14] Foucault M.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27.
- [15] Hermans T.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5-16.
- [16] Schramm W.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 Retrospective View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3, 33(3): 6-17.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r discourse strategy

PAN Linling, XU 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knowledge division, discipline designates “impermeable” boundaries with differentiation and exclusiveness.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grows into a comprehensiv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after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turn, which develops great “interaction” with other disciplines in de-disciplinary path. The nature of discipline is power, in which case, the motivation of being a discipline rests more on discourse strategy for academic power and survival. From the point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discipline is not the final go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hose future focus should shift from “discipline” to “knowledge.” And in the long run, doing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within discipline will be the rational choic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discipline; translation studies; knowledge; discourse

[编辑: 胡兴华]